

R
505
989.7

今日評論

期二第卷二第

時評

敵人佔據汕頭定海(山)

中蘇商約簽字(興)

法國信用借款成立(東)

中國經濟建設的目標

中國人民族意識的推動

我國政府統計事業的商榷

說永北的石刻吳裝觀音像

談吃飯和睡覺

嚴中平

谷春帆

戴世光

滕固

陳雪屏

日二月七年八十二國民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時評

敵人佔據汕頭定海

近日敵人在東南海岸又肆蠢動，先後于粵屬汕頭浙屬定海登岸。雖經我當

地駐軍壯丁浴血抗禦而二地皆以迫處海濱，敵艦威脅的力量過大，于短期內陷落。

汕頭為東南名邑，杭路北接廈門，南通香港廣州，在廣州廈門相繼失陷後，她是閩粵間主要的商埠。定海是杭州灣外有大島上的城市，牠沒有汕頭那樣出名，在商務上，牠也沒有汕頭的重要。然而牠既是舟山羣島的重鎮，而舟山羣島又是浙東閩北的屏障。牠失陷之後，敵人控制閩浙洋面的勢力便伸進了我們海防藩籬之內。從海防上講，定海的失陷比汕頭更為重要。

可是，在我們現在抗戰的階段，兩城市的失陷都沒有甚大的影響。我們既沒有海軍，海崖的防禦又沒有現代化，沿海城市不能支持敵人海陸空軍的猛襲無容諱言，汕頭定海的被佔，只要敵人有此企圖，自在意中。我們現在的戰事已早離沿海一帶而轉入內地。勝負的關鍵，不在于沿海二三城市的得失，而在于內地戰局的演變。汕頭、定海，就其本身的地位說，固然重要，然其重要性已因戰局階段的不同而消失。

軍事的影响既然不大，敵人佔二地的影響還是在于加緊封鎖我們對外的關係。廣州上海失陷之後粵浙閩各省內地進出貨物充分利用非淪陷之埠頭。于是汕頭溫州甯波等地都變為重要的口岸，因為種種的理由，敵人當然想破壞這對外的經濟關係。月前敵機連續轟炸閩浙各海口，敵艦亦時在閩浙口外窺伺，其目的皆不外威脅各口對外的商務。汕頭定海的佔據也不過這個威脅進一步的舉動而已。

加緊封鎖固然與沿海沒有失陷區域以相當的不便，然而我們現在經濟力的寄託也不在這沿海未失陷的區域。只要我們新的國際路線能够早日觀成，

內地的經濟能够速加以培養與調整，我們國際的經濟關係也可以構成一個新的基礎。這就看我們這一方面的努力了。(山)

中蘇商約簽字

我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多年來向處於不正常或不甚正式的狀態之下。蘇聯是第一個以平

等待我的大國，對國民革命亦曾有大助，不幸十六年清黨以後中蘇即斷絕國交。既云斷絕國交，則領事似亦應在停派之例，然而中蘇斷絕國交之後，兩國依然互派着許多領事。以後九一八事變發生，中蘇俱視日本為惡敵，於是我方顏惠慶與蘇方李維諾夫乘同在日內瓦出席軍縮會議之時（一九三二年七月），舉行談判，恢復了邦交，使全世界驚奇，更使日本震動。經此而後，商約的訂立應該是最遲轉的事了，然而經多年而又終無一成。我駐蘇大使顏惠慶努力過，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也努力過，但是俱不成功。不成功的最原因聽說是政治的。在這些年內，訂結不侵條約的健議也提出過，也未成功，理由也是政治的。

及前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則中蘇間的關係頓自疏而親，自懷疑而互助。所以商約縱未成立於前，而各種以貨易貨的協定則成立極多。上月十六日更由特使孫科與蘇方國外貿易部長米高揚簽訂商約（中央社重慶二十四日電）。商約內容，我們尚無所聞，但以目下中蘇友誼之篤，我們敢斷其於兩國必均有利益。孫科於本年底即到莫斯科，其隨從中頗有很熟知國內經濟情形及交通形勢者，這商約當顧到我國交通上的需要，而予以直接的或間接的促進及援助。

同時，難產的中蘇商約既已安全地降世，我們更深望自今而後，一切外交、文化、政治、經濟的關係，俱能益趨圓滿，益趨發達。外交關係為一切關係的媒介，如果我國今日在莫斯科並無常駐的勝任大使，我們也立須有此

大使。這是要附帶向政府進言的。(與)

法國信用借款成立

按照國際聯盟大會及行政院歷次關於中日爭端的決議，各會員國有許多義務，其中之一給予中國以財政上的協助。此種協助，英國於去年十二月中旬即開端了，雖則其數量至今仍極微小。法國也早盛傳借給中國二萬法郎信用借款，然而歷久不見成功；我們望眼欲穿，頗生疑惑。今據各通訊社上月二十四日所得來自香港的電訊，則一百五十萬磅的信用借款已於二十二日成立；先一日倫敦路透社廣播亦有此消息，料來必係事實。雖電文十分簡略，未將借款性質說明，但當係與傳說已久的二萬萬法郎借款是一件事，性質也當與去年秋底的英美信用借款相同。

此一百五十萬磅的新借款，可說是各友邦對我信任對我抗戰前途樂觀的新表示；在法幣對外匯率方跌之時而有此表示，尤其是可喜。這是就我國的立場而言。

從法方面說起來，這次的放款可以表示法國對遠東的認識有進步。法國的遠東政策年來本是隨這英國而變化，但法國總要比英國落後而冷淡。邇來法國一方面予我以經濟上的援助，又一方面則與英國在新加坡開遠東軍事會

中國經濟建設的目標

討論經濟問題的研究程序，計劃經濟建設的實行步驟，不論研究起來實行起來，多麼困難，理論上的中心思想，不容有絲毫的牽強！此點應首先確定不移。

一個社會的經濟機構，是以生產事業為中心而運行的。因此，不論戰時或戰後，經濟的調整或建設，必須生產事業為中心目標。生產事業可以依照幾種不同的分類方法，劃成許多不同的部門。為當前的目的，我們可暫時把劃為生產工業原料品的農業，和加工農產品或採掘自然富藏的工業兩大類

議(上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討論聯合抵禦侵略的準備。前些日子，巴黎舉行殖民地會年會時，法屬前任越南總督烏德烈也曾發表一篇強烈的演說，略謂日本在華行動直接威脅法屬安南的安全，自海南被日軍佔據，即已受其威脅，為今之計，宜在越南金蘭港建造軍港以為法國遠東艦隊的根據地。殖民部長芒特爾則謂對於此事已在繼續計劃中云云。大會旋即通過下列議案：(一)主張採取強硬態度，以維護法國在遠東所保有的權利，尤其是上海法租界與公共租界；(二)日方如再引起糾紛，英法兩國應禁止日本商船利用各該國在遠東之港上以資報復；(三)贊成金蘭港建設海軍根據地建議。這些經過，與借款案合併起來，很足以顯出法國正在放棄其一向袖手旁觀的態度，而採較積極的態度。法國這種轉變，我們固然嫌其較遲，但對於遠東的正當解決當然也不會毫無裨益的。

自抗戰開始以來，法國一般人民對我的同情初不在英美人民之後，惟對法國政府的交涉向來是不甚易辦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政府的態度居然能趨於積極起來，一半固然是勢所速成，一半也要歸功於我國駐法大使顧維鈞不斷的努力。所以在借款成功之際，我們於表示滿意之外，也願對顧大使表示一種謝意。(東)

嚴中平

。農業工業云云，已是眾所熟知的概念。這裏我們應特加注意者，是農工業發展的平衡問題。在中國，如果這兩個部門不謀得平衡的發展，全體國民經濟的進步，依然渺無希望。所謂平衡的發展就是要工業能從農業部門取得充分的原料，而農業部門又能充分地消納工業產品的意思。這個平衡性的前半，在今日尚不成為嚴重的問題，但也不是全無問題的，譬如長絨棉的生產，已經不足供國內棉紡工業的需求等等。後半確已嚴重得多；過去農村破產所給與中國工業界的打擊，尤歷歷可數，前車之鑒，不可不深自警惕，全國



村，經此次戰爭的破壞，又已較前疲憊萬倍，因此，戰後工業發展中的農業問題，更不得不謀妥善的解決。

要推進或是調整一個或多個生產部門，有無數的問題需要解決。我們不常支離破碎頭痛醫頭無主見無計劃地去隨時應付，我們要尋出幾個中心問題來。原則上我們既已確定農業工業併進為此後經濟建設的中心目標，次之，便要把握推進農業工業前進的樞紐，藉以決定實踐的方向。

任何生產事業的推動力量，不外來自兩個源泉：其一為生產技術，其二為生產關係。所謂好的生產技術，不僅包括優良的機器，亦且包括熟練的工人和嚴密的組織；若合理的採購方法，機敏的推銷政策，精確的成本計算等等，又是影響生產效力，左右生產成本的重要因素，其於生產技術之發展，常有阻撓或推進之功。謂生產關係，不僅包括工業裏勞資的僱傭關係，亦且包括農業裏主佃的租佃關係；若工業資本家與金融界的信用融通，農村高利貸者與農民的貨物或現金的賒借，又是生產關係的外圍層，其於生產關係的發展，常演有極大的作用。一般說來，推進生產事業的發展，不外改進生產技術和改善生產關係兩途。技術改進和關係改善的着力處，大體有如上所述。不過，此後對農工兩業的推進，是要洞察這兩業過去發展遲滯的癥結所在，而分別確立着手於生產技術之改進，或生產關係之改善兩途，究應何者應偏重於何方的。因此，在實際決定施行計劃步驟時，必須將農業與工業，甚至將不同地域的農業或不同部門的工業分別考察。

一般說來，中國的生產技術確不能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相較，中國的生產關係也還保留中古封建制的實質。但在這總的落後情勢之下，現時農業與工業所達到的階段，顯然是有差異的。在工業方面，我們也可看到一二輕工業的建立，只是不能前進；在農業方面，則鋤頭鐵刀，無一非千百年前的舊式樣，化學肥料的施用，可說還沒有走出農事試驗場的大門。造成種種落後的原因，鄙意以為在農業應從生產關係裏，在工業應從生產技術裏去尋找。

中國的農業經營，是在園藝式的零細耕作方式之下進行的。土地所有權的分配，頗不公平。如果一個佃農只耕種一小塊土地，還要將他收穫物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交納給地主；如果一個自耕農終年的勞力所得，最終不得不把大部分穀物送到高貨者的荷包裏去，那麼農業的生產技術，何來改進的機會？戰前中國土地關係問題的嚴重程度，是隨地而異的，惟此一問題之要求急速解決，則差不多是全國一致的。歷史上，廣大的水旱災荒，長期的戰事，常常加速土地關係的分化過程，而使佃農小自耕農愈加沉淪下去。但政府之改進土地關係，也常常是在這種荒亂之後，纔有廣汎實行的機會的。此次日寇侵我國土，作戰方法之殘酷，劫奪行為之普遍，對我農業生產之破壞，實是空前的。因此我土地關係之發生急速的變化，當也是必然的結果。為恢復戰後的農業生產事業，以促人民之復員；為促進農業生產之進步，以配合工業的發展，我們的措施，應以解決土地關係問題，為中心的任務。

工業方面，過去，我們落伍的原因，主要地不在生產關係，而在生產技術。而我們即當力謀發展的，也正是在生產技術上。社會組織如小農業經營與手工業之結合，如以商人僱主為領導的散工制度如工場形式的手工業機構，或則利用餘暇，或則利用低率工資，對於新工業的發展，會給以無窮的阻撓。但這關鍵不在手工業於新工業發展下有其永存的理由，而在新工業本身有其尚未補足的缺點。決定的因素是生產技術，勝利的一方是進步的生產技術！中國棉工業的機械化過程是先從織業開始的，到了四十餘年後的今日，織業機械化的程度却遠落在紡業之後：戰前全國的棉紗總產量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手紡的，其餘百分之八十三都是機紡的；全國棉布總產量中，手織者却佔百分之六十一，機織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有許多人看到這種情形，便想像中國的棉工業生產會永久用手工業形式來經營，於是努力於手工業的提倡。我們的意見却正相反。機械紡工業對手工業的勝利已有事業給與證明。織業後於紡業的發展，乃是由於這二個部門技術上的差異所致。以中國的設備來估計，每人每日使用紡機的紗產量約當使用手紡車的紗產量的八十倍

，每人每日使用動力織物的產量約富使用手織布匹的四倍，這種差異決定紡織兩業機械化過程的遲速互異，換言之，生產技術的發展程度決定一個特殊生產部門裏新舊一種設備的競爭，決定勝負誰屬，決定決勝的時期久暫。生產技術是最後的決定因素！如果我們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可以確立工業建設的中心任務，那就是：改進生產技術——具體言之，動力化，機械化。

原則上，農業致力於土地關係之調整，工業致力於生產技術之改進，同時謀農工業之平衡的發展，這是我們此後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原則既立，可檢視過去經濟發展有何重大病症，以資設計之參攷。

過去經濟發展的病症，大要有三：

一曰外勢力的侵入與擴大 造成外資侵略之可能的，主要地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條約；造成外資勢力之擴大的，可說全部由於國內經濟發展的落後，結果，夜郎自大，反客為主，成爲我經濟發展上第一個重大病症。譬如採治，煤礦以撫順開採爲最大，日英分佔之；鐵礦以大冶本溪湖爲鉅擘，日寇佔之。於是無限富源，任人囊括，國人用煤以不得不求之於洋商；鐵砂運日，授人以殺我之利器，而我一管一釘之微，亦須仰給於歐美。譬如交通，浩浩長江，本是天賦我優良的內河航路，而日清，怡和，太古各商，鳩佔之勢已成，舳艫千里，何處不見外輪，鐵路本是一個國家的動脈而我們控制這些動脈的權力，却有一半不在我們自己手裏；於是火車爲償付外債而行駛，那裏說得上合理的鐵路政策？我國新工業以、棉織、捲煙，等業規模最大，紗產之中，日商佔百分之四十九，英商佔百分之三，而我華商尚不及半數，布產之中，日商佔百分之六十四，英商佔百分之六，而我華商又不及三分之一。（均根據二四—二五年數字）。至於每年捲煙銷量，洋商所產約佔百分之六十一，華商僅得百分之三十九，華商百零六家僅納統稅三千四百萬元，英美煙草公司一家已達五千四百萬元。捲煙、棉紗、麥粉、火柴，等八種統稅物品共納統稅一萬三千六百萬元，洋商約佔六千七百萬，華商僅六十三

百萬！（均根據二十四年度數字）。統稅爲我主要財源，因洋商勢力之強大，遂致我財政政策之執行，亦不能不有所顧忌。統稅實行之初，上海日商紗廠聯合會居然推派代表，晉謁我財政當局，要求減低稅率，豈非咄咄怪事！外資之坐大，成於條約上的特權，已堪痛心；成於事業經營上之不善，我人尤當反躬自責。養癰致患，遺害無窮；此後利用外資，萬不能再忽視過去之慘痛經驗。

二曰投資方向的偏榮與偏枯 決定投資方向的經濟因素，主要地是利潤或利息水準。在純粹自由競爭與自由發展的前提下，工商紙各部門的發展，大體是由利潤率指導其榮枯的；同時工商業的發展，多少亦有平衡利潤率的作用。不過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因受外力的壓迫與內部的腐蝕而歪曲，平衡作用因也不能實現。公債過高，社會乃有大量的資金被其誘引；商業都市有畸形的發展，於是乃有地產投機；自生絲成爲世界商品以來，我們絲業界的努力，至多只做到烘練，而沒有絲織，有頭無尾，世界最大產絲國的絲織物，倒要到別的國家去販運；大的鐵礦既被外人壟奪以去，新礦的勘探，又無人過問，自然連縫針也得使用洋貨了，一方棉織業急急不可終日，他方漂染業無人問津，我們既沒有基本的化學工業，又何來漂粉染料呢？一部汽車，從鋼到橡膠，從機器製造到染漆配製，差不多關聯到每一個工業部門，我們這支零碎的工業建設，那配自造一部汽車？農村裏輪清無慮千萬的餓殍，都市裏建起瓊樓玉宇的舞所；這種種農業與工業的不平衡，消費品工業與生產工具工業的不平衡，半製品工業與製成品工業的不平衡製成品工業與加工工業的不平衡乃至金融資本與工商業資本間的相擊相離，遂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的呆滯的狀態。如果我們要建設工業，我們必須考慮工業部門間的聯繫性；如果我們要改進整個國民經濟，我們必須考慮全部國民經濟的一致性，總之，我們要控制投資方面，絕不容牠有偏榮枯之象！

三曰區域分配的充血與貧血 區域的自給經濟，是中古的遺物，在高度發展了的國家，絕沒有一洲一省能在經濟上獨立自在的。經濟發展的地域分

配，只能依地理上的特殊情況而發展特殊的部門。爲了建國，絕不容發展某地，萬事皆備，而其他地方，一概不管的念頭存在。過去我們的工業，都集中到沿江沿海都市裏去，於是需用原料，要從遼遠的內地去採辦，推銷產品，又不得不搬到遼遠的內地去。轉手愈多，成本愈高；路途愈遠，負擔愈重；更何況我們的交通工具如此竊敗，沿途關卡，又如此衆多？所以，內地的原料生產者痛心於不得合理的售價，上海的工業製造家苦於成本太重，而內地的製品消費者却又購辦不起。不得已，祇有賴手工業來滿足需要了。區域

中國人民民族意識的推動

谷春帆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之夜，日軍在中國故都北平城外蘆溝橋起釁。大時代的烽火，從此燃燒起來。在一年半以內，不單燒遍了神州禹域，燒遍了黃河黑海長江兩壘，燒遍了歷史上文化的積累，並且在燒着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燒乾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眼淚。使每一個中華兒女，無論在國內在國外，在天涯或海角，只有赤緊的憤怒與悲痛。這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對外全民族戰爭，這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對外民族意識的集體表現。中國的兒女，一向在壓抑煩悶的情緒下生活。他們不單像各國青年一樣，有個人的煩悶，他們主要的只是國家的煩悶，與民族的煩悶。蘆溝橋的烽火使一百年來煩悶沉鬱的積憤得到爽快發洩的機會，得到以自己的血與淚與鐵來親手安排中國運命的機會，他們安得不慶幸？安得不驕傲？

誰能瞭解這一百年來中國兒女的煩悶，而順應他宣洩他，誰是東亞的主人。誰敢藐視他而與他挑戰的，誰會逢着最堅決的抵抗。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是近百年來中國史的一個主動力，亦是近百年來世界史的一個大關鍵。

中華民族政治上雖屢受外統治，但中華民族兒女，從未失自覺性，從未失却其中華民族之意識。中國人始終自認爲中國人，以別於外國人。近百年來的對外交涉，對外戰爭，處處失敗。每一次失敗，即在中華民族自覺的民

的充血與貧血，不僅存於工業界裏，亦且存於農業界裏。以中國之大，農產之豐，食根本是足以自給的，可是每年却有大量的米麥進口；甚至有此區穀賤傷農，彼區家無口糧的現象。這主要的原因，在於運輸之困難，和封建的社會關係之阻撓。因此，我們經濟建設又不得不考慮交通問題；總之，不得不考慮區域分配上的充血與貧血問題。

社會現象，永遠是互相關聯的；推進經濟發展，要在把握中心問題。筆者得幾個原則上的看法如上，具體的計劃，則有待於更進一步的探討。

二八，六，二三。

族性上，增加一條創痕。不但有志節的人與一向處在統治階級的士大夫深深被民族的羞恥與憤痛所煩惱。即被統治階級的勞動羣衆，因爲帝國主義之侵略，因爲受不平等條約之偏面的束縛，因爲歷次對外戰爭之慘酷的失敗，一樣有自覺的民族意識，一樣常常被民族羞恥的痛苦警惕着。一個民族，能够在一百年內，累次並深深地蒙受這種煩惱鬱勃的民族情緒，而不至於發狂，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只要將凡賽爾和約到希特勒德國的瘋狂情形一比較，就覺得中華民族的兒女，經過四千年歷史的陶冶，還是比較太老成太耐氣了。

一位戰地通訊員——立波——在山西一個小鄉村——洪子店——住宿。屋主是一個六十多歲白頭髮的老人。他保存了三十八年前——庚子——一個洋兵用小刀鏤刻名字的桌子。經過三十八年的磨洗，這西文名字還可以依稀辨出起首是個C字。（見立波所著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八國聯軍之役，是中國北方農民反帝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自然是很愚蠢而沒有近代意識的舉動。但是當時洋兵的暴酷，在三十八年的完全隔離與和平以後，還深深鑄刻在農民們心上，反映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們還記得德國兵在城外山上用水龍噴火油到城內，使羅馬的大火，在山西邊原上燃燒。野蠻的得意的嘲笑，與漫天烟火下妻兒的哀哭對照。昔日校場閱師的原武，與現在荒涼的歲月，一一還深深鑄在老

年人的腦中，並從他們的傳述中，普遍印入後一代中華兒女的腦中。復仇的女神，時時照臨他們，三十八年的隔離與和平，不會使他們忘却慘痛。人類不是和平的動物，根本也不會從和平中得到生活。抱這樣意識的民族，還能容忍日軍的殘暴嗎？還能忘記日軍的殘暴嗎？

從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的中國史，是一部錯綜複雜的人類活動記錄。其間有對外戰爭與對內戰爭，有君主立憲，有民主革命，有共產，獨裁，有農民暴動。一個以故事歷史的觀察家，感於這許多矛盾複雜的活動，會得迷惑尋不出頭緒來；或只能觀察到每個問題的因果關係，而把握不住整個歷史的中心關鍵。其實任何歷史，均只是羣衆意識的表現。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以迄中日日俄之戰，八國聯軍之戰，處處逢到對外交涉之失敗，與外國之侵略。故中國近代史中所表現之種種活動，不獨其對外的關係，即其對內的關係，亦處處爲這種壓抑憤痛的民族性尋找發洩的結果。要明瞭中國近代歷史的整個性，只有從這一點上出發。

鴉片戰爭時，廣東民衆組織不英國，號召數萬人。這是中西交涉的第一幕。其時已經就發動了民族意識。自後各地仇洋排教之案極多。到義和團之變而造極。以義和團之荒謬怪誕，尊孔衛道的一般士大夫豈有可以相信之理。然而當時竟會得造成如此巨變者，正因為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號召，正拿羣衆心理，亦正拿士大夫統治階級的心理。在數十年壓抑憤痛的民族意識，得到一個似乎可能的發洩機會時，像火山一樣的暴烈熱情，決不是理智考慮所能阻止的。在歐戰初了時，誰會相信希特勒墨索里尼之瘋狂政治，會成爲今日中歐之主宰。然而歷史竟依着德國意國的羣衆心理走了。

義和團之變，是中國民族意識，忍無可忍的發洩。他不是統治階級自尊自大心理的表現，而是一般農民，一般勞動羣衆，普遍的要求。義和團的挫敗，給予中華兒女以更深刻的民族羞恥。使他們向外噴烈的熱情，轉而向內。使他們感覺要對外抗戰，先要從內政改革入手。他們以熱烈的情緒要謀中國之富強。從康梁變法，到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北伐，到國共十年內戰，

這數十年苦痛流血的過程，就只是被壓抑的民族意識向內發洩的結果。一切對外失敗的痛恨，歸咎於內政之不當，國家之不能富強，因之移對外之熱情怨恨而對內。要求改革一切制度，無論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或以爲君主制度是腐敗的總原因。或以爲階級統治是罪惡的總原因，有人主張改革兵制，改革教育，改革實業。亦有人主張改革思想，改革道德，有人主張公妻非孝。有人主張復古禮經。我們綜攬近百年來中國政治道德教育思想各方面之活動，覺得其營營蠢動得利害。屢次的對外戰爭，屢次的內部革命，不單無數青年人肯拚擲頭顱酒熱血，即最保守的階級亦往往是主戰最力的份子。不單是知識份子統治階級的人焦心苦慮要謀中國之富強，即農民 勤大衆，亦會得揭竿而起，以抵抗外國的侵略。一次失敗，即來二次。此處失敗，即起他處。對外碰壁，即轉而對內營營蠢蠢，表現無量活力之盲撞。這是一個深厚的民族自覺，長時期內被憤痛羞恥壓抑而發洩的共通現象。在個人交往間，一個被抑制的深切熱望，會得使人瘋狂。在民族國家間，人的深切熱望，抑制的民族，會將成爲瘋狂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不致於完全瘋狂者，還是因爲他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農業民族，還是因爲他二千餘年來傳統的和平的民族性。

康梁六君子戊戌變法的主張是『務農勸工惠商恤窮』，是要致中國於富強，是屢次對外失敗後要求內政改革的第一次呼聲。係中山先生的與中會同盟會，其綱領是要求富國強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黨之出現，亦是對外交涉屢次失敗的結果。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雖然各不相謀，而從原因上說，竟可以說是一種運動之此方面的發展，同樣是變勃的民族情緒之對內的爆發。這種變勃急切的情緒，非但屢次變法革命發動的主要原因，並且也是屢次變法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他成爲決定中國歷史的主要原素。

民族的羞恥太深，民族的情緒太緊張，所以在任何一些星火的導引下，可以發生燎原的火。也因爲始終只是在怨毒緊張的情緒下，所以種種蠢動

，往往顯得沒有深切考慮，甚至淺嘗淺止，沒有了解一種運動的真義。機械的或割裂的模仿外國。廢棄舊的政制，而模仿其民治，模仿其共產，或希望模仿其獨裁制度。廢棄科學與書院的教育儲才制度，而盲目的模仿其學校教育，模仿其職業教育。舊的逐漸破壞，而新的却雜湊起來，不成一貫的條理。一個美國式瑞士式的民治政治；一個德國式日本式的軍隊訓練；一個沒有道德哲學的教育制度，一個大多數依舊是自耕自給的農村經濟社會，一個十六七世紀的封建自門的軍閥制度；這樣是一個雜湊的中國，並不是像許多外國人所說，中國人根本不夠維新。這是因為中國人太急於維新了，中國人求民族富強的情緒太熱切了，所以弄成這急不暇擇的怪樣兒，也所以註定了歷次維新運動失敗的命運。

戊戌變法只有短短幾個月，而光緒變法的手諭多在數百次。只是些空洞廣泛的原則，究竟要從何處入手做起，恐怕主持變法的康梁諸君，也不見得會有深切的認識，這可以從康梁諸君以後的政治主張而推論的。這種情形，一方面表示改革的急切，與不瞭解改革的需要，同時惹起了反動的勢力，而有戊戌政變之失敗。戊戌變法，就失敗在空泛與急切的民族情緒上。

辛亥年武昌起義的革命，同樣被急切求功民族情緒支配着。這次革命，在幾個月內，兵不血刃，而推翻數千年的專制政權，二百餘年的異族統治。這時的民族情緒多趨於發洩。但是隨中華民國的誕生，革命軍馬上妥協，而造成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局面。改組以前的國民黨，則是許多氣味不同的分子，在一個目標下鬆散的遇合。這個目標，就是以推翻滿清為當國強民的第一步。滿清已推翻了，革命已成功了，國民黨也散了。急於要求統一富強的民族意識；打消了辛亥革命的一切努力。

我國政府統計事業的商榷

戴世光

際目前舉國上下以抗戰建國為唯一的目標來求最後勝利的重要關頭，當以生產建設為最基本，可是建設決非空談，須有合理的計劃，方能逐步實現

從國共分裂以後，十年來的勦共與長征，這種慘痛的經驗與損失，可說是充分表示不妥協的精神。但是在九一八以後，外患的壓迫下，共產黨表示了聯合的希望。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西安事變的結束，確定了國共一致抗日的基礎。同時福建的事變，兩廣的事變，均在外患緊張的關頭下和平解決。

這些歷史的事實，說明一個共通的原則。即是累次的革命，與頻年政爭，只是為了一個前提，為了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革命是血熱的衝動，而中國的革命特富妥協性。辛亥革命，均以妥協失敗。為什麼？因為中國的革命，其目的急於要求統一，急於要在統一中建設起來。「安內攘外」，這是一貫的全民革命國家統一政策。辛亥革命雖然建立了民主政治，但中國人實在不需要，也不了解民主政治。所以辛亥革命，均迅速失敗。事實上，辛亥革命的真正動機，是民族覺悟情緒的對內發洩。革命表面上的成功，使覺悟的情緒已經得到發洩，即是革命已達目的。革命的志士，奪到政權，希望實現其「富國強兵」的幻想。革命的不良分子，達到目的，希望實現其名利權勢的夢想。同時民衆對於革命，也認為已經成功，而希望其建設強有力統一的國家。在這時候，不單革命失去領導，並且失去民衆的支持，革命黨人即使不願妥協，而要求繼續為革命奮鬥。無如革命的前提已失，民衆也會得被民族意識所指示，而要求妥協，要求從團結統一下去建設新國家。這從十年來國共戰爭時，一般民衆之渴望和平團結，可以證明。民族意識自始至終，是一切問題的發動力，他匆匆製造了革命，也匆匆收束了革命。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之故，革命只能在妥協下軟化，不能在不妥洽下硬撐。

，更需要根據實際的情形來決定這計劃的內容。正如同一個商店的主人，如果不知道他的商店究竟存貨多少，現金若干，多少債務，市場上的需要如何

，而妄談擴充，則計畫之不能實現，自可想像而知，即設勉強推動，則十分之八九是要失敗的。因此政府既為一個國家的主腦，負責推動各種基本建國的政策，自然應該在幾種特殊之目的下，能準確的明瞭國內有關於該目的之基本事實，以為決定各計畫內容的根據。不過我們要注意上面短短的幾句話，裏面有幾點是值得提出來的：第一，是要有特殊的目的，換言之，是「有所謂」的。第二，這種事實是基本的。第三，這種事實要能準確的明瞭。當計劃時一定要在事實上把握住上述的三點，才能有所根據，如果用學述上的名詞來說明上述的簡單的原則，則基本事實當用數字來準確的描寫時，即為統計資料；而「明瞭」的前提是這種基本統計資料的整理。因為一個國家中有多少事實在那裏生長消滅，實際上若把所有的事實都加以測量，是不可能的。即設可能，也毫無意義。一定要為了某種特定的目的，來決定那些是應該搜集的，那些是不應該搜集的。等到搜集進來以後，自然需要一個有系統的整理，否則一大堆原料，如何可以「明瞭」？不「明瞭」如何能作為計劃的根據？那麼政府既為全國首腦，他是應該負責搜集這種基本事實的。唯有政府才能顧到全局，也唯有政府才能有這種力量來搜集這種基本事實。如果再用一次學術上的名詞的話，這種政府所担任基本統計資料的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即政府的統計事業。

好了，我們既已說過，為了博得最後的勝利，我們首先應該增強我們生產的力量，而推動整個增加生產的計劃，尤其須要準確的統計資料作參攷，現在僅就統計事業上可注意的問題，分別加點說明。

25

我們以為我國政府的統計事業，在推進的途徑上，有兩方面的問題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是外在的問題，一方面是內在的問題。我們現在光談談外在的問題。本來籌辦一種統計事業，首需學識上的灌輸。是以在統計事業本身之外，尚須與統計學術謀得一種聯繫。我們試由統計發展的歷史來看，最初只是少數的政府為了戰爭和徵稅，而搜集人口方面的數字。繼而進一步作國家與國家間基本事實的數字的比較。內容方面不僅是人口，還有財政，貿

易，生產等重要的事實，若以各學校中的所設的課程而論，當時是由政府官吏或對這種事實有興趣的政治經濟教授，分別授課。名目上雖已稱它做統計學，而討論的內容，重要的却是各種統計資料的意義；這種資料的來源，以及如何簡單的整理以後，可以分別下各種解釋。在此以後，統計因數理之助，才由簡單的整理而至高深的分析。延至今世，統計學理上發展的趨勢，才由分析而進到選擇問題，和選擇的結果是否有意義的問題。這是由一般的統計發展的歷史而論，是縱的，是統計在歷史上發展的各階段。這些階段由目下橫的而論，因為各別有存在的意義，於是在廣義的統計範圍中分別成了若干部門。是以無論由歷史發展的階段來說，或由目下統計範圍的各部門來說，這些階段或部門分別形成若干環，為了統計事業與統計學術有聯繫的話，這些環是應該牢牢的連鎖着，然後才能互相提攜，平均的發展。可是我國統計事業與學術來看，環是有的，却不連鎖，尤其是統計資料的意義，及該資料在各個應用範圍中的解釋及限度問題的一環，似乎是不大健全。因為由統計學的性质而論，它與一般的科學的性质稍有不同。以統計學的原理而論，它是屬於自然科學的，可是以它的應用範圍而論，却包括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的統計方法，當它應用到不同的科學範圍中時，它會有不同的解釋和限度。所以統計方法在應用時間問題最多，也最分歧，在我國的這一環却無人顧到。完全在統計理論上發展的人們，以為這是應用上的問題，他們所以不管，而在各科學中有研究的學者，又以為統計是一種工具，沒有興趣，結果這一環就根本沒人來管，沒人來注意。在統計事業與學術的聯繫問題，這是主要的一環，此環既不健全，又不連鎖，欲求推進統計事業，當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至於內在的問題，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把搜集統計資料當作目的，而根本忽略我們是為了解決某問題，才搜集某種資料，就我國的政府統計工作而論，除了幾個學術機關及中央統計局等分別由專家主持者以外，各機關不無有以辦統計為時髦的心理。很多是把搜集統計資料作目的

。此目的，當然只有多發調查表格，要填數字，勉強算一個百分比，畫幾個五彩圖，就可以交卷，同時可以邀功。此種現象推廣以後，彼此效尤，辦的統計事業雖多，可用的資料却少，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第二是統計人材的缺乏。即以國家政治區劃的基本單位——縣而論，統計室的人員多半是不懂統計的，現在硬把責任放在他們的身上。在一種不知統計資料中數目字所表示的意義的觀念下，就是主辦者有志想搜集某種資料，他也認不清應該如何供給。結果根本談不到準確可靠。那麼統計資料雖有，並經過分析，結論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雖很有完備的統計制度，若果缺少基本統計人員來推動，那麼統計事業又如何能改進呢？

說永北的石刻吳裝觀音像

滕固

顧憲良先生看見漢人張劉敏的「棒與遺稿」裏有一首詩，歌詠圓通寺石刻吳道子觀音像，他問我有沒有看見過這塊石刻？我遲疑了一回說，沒有看見原石，也許看見過拓本。十多年前我在上海買到過一幀吳道子觀音像皮紙朱拓本，據說是從雲南來的，莫非就是圓通寺的，我當時這樣想。圓通寺近在咫尺，每個禮拜要經過好幾次，我從前所得的拓本是否就是圓通寺的東西，似乎不難證實。有一次帶了一位拓工到圓通寺去看這塊石刻了，我一面要拓工把牠打拓下來，一面感到這石刻同我以前所得的拓本頗有不同，因為記得很清楚，我的拓本有好多地方漫漶損耗，不像這石刻那麼完整。我就委託拓工，要他留意其他的地方如吳道子的石刻，一起替我拓下來。不久，拓工送來二件東西，一件是近拓的昆明文廟的孔子像，另一件是舊拓的永北的觀音像；於是我才得證實從前所得的拓本是永北的石刻。

圓通寺的觀音像和文廟的孔子像，一望而知是年代很遲的，翻了又翻的東西。光緒昆明縣志，大約因為「孔聖遺像」有「吳道子作」四個大字，就把牠放在唐碑之列。要知道曲阜的吳道子聖像還是宋紹聖間的石刻，滇中祀

當然籌辦幾種統計事業，決非一朝一夕的事。不過我們可以在抗戰建國目標之下，當需要幾種特定的基本事實最迫切的時候，對我們政府的統計工作不妨加以調整。由外在的問題來說，最好多由實驗上入手，多討論各應用範圍中的支節問題。各國的客觀條件不同，非由本身的經驗謀規範不可，而內在問題，則應該在經濟的條件下，搜集的統計資料只限於少數幾種重要的，而務必先把搜集該種統計資料的目標確定，各機關不可不辦統計，要辦就是重要的，可靠的，同時是有意義的。在統計人材方面，應該有一個最低的訓練，去負責辦各基本位的統計事業。如此上有確定的目標，下有健全的基礎，然後旁與統計學術取得聯繫，那麼我們政府的統計工作才能發揚光大，而有裨於將來建國者也非多。

孔的風氣較遲，這石刻恐怕還够不上元刻。圓通寺的觀音像，現在知道是永北石刻之不齊高明的做刻物。

凡各地方規模較大的佛寺和文廟，我們很容易找到吳道子的畫像石刻。吳道子的作品富有暗示力，自始即在宗教宣傳上具有甚大的作用。黃伯思「東觀餘論」裏說他的地獄變相圖，「有一種陰氣襲人而來，觀者不寒而慄，足以捨惡而就善道，誰謂繪畫為小技哉。」他的作品據各種記載，多屬寺廟的畫壁，這些畫壁經過唐宋會昌五年和後周顯德二年的滅法，已蕩然無存。所以在宋代已難覓得吳畫真本，米芾畫史中說：「今人得佛，則命為吳，未見真者。唐人以吳集大成而為格式，故多似。」刻石之舉，一方面固然是宗教上的利用，他方面殆亦宋人珍惜吳畫而使其流傳久遠的意思。但是所刻的畫像是否本著吳道子的真本，看了米芾的話，就難令人置信。以石觀音而論，我在南北各地所看見的，不下十幾種；除了徐州雲龍山的觀音像，有正統五年重刻的記載外，其餘都不著明鑄刻年代。所有觀音像，結構大同小異，不過在我的記憶中，徐州的已比河南的東西差，京杭一帶的更比徐州的東西

差，大概是後來翻刻的，離開舊本愈遠。要從這些石刻中窺探吳道子的，或唐人畫佛的陰影，是不容易的。

永北的石刻，照我的觀察，以為比徐州的東西還舊，恐怕是明以前的刻物。（永北的志書內也許有記載，可惜目前借不到這類志書。）這石刻的右面刻着一行隸書「唐吳道子作」，左面密密地刻着六行小楷，把夏文彥「圖繪寶鑑」裏吳道子略傳從頭至尾抄在上面。又在第一行小楷之上，加刻一行寸楷「唐吳道子作」四字。這樣一刻再刻，無非致人重視牠，並且要努力證明確實是吳道子的。就畫像的本身看，頭部蓮花紋的髮髻圍飾，和所傳燉煌的唐畫確有共通之點，然已較近於宋人的佛畫體製了。身體姿勢所具的曲線，還留有唐人的傳統；大體端莊莊嚴想來原體不是沒有來歷的。還有這個石刻畫像有二個顯然的特點，一是容相還留有「擬彫刻的」跡象，另一是衣紋用「蘭葉描」繪成，這是值得我們玩味的。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裏說：「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密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六七年前我根據了這一段話，又搜集了些北朝造像的淺浮雕來觀察，曾在一篇討論繪畫歷史的文字裏，（此文發表於一九三五年某期的 *Stitch*）說曹衣出水的風格是「擬彫刻的」。當時的佛像雕刻，規撫西域的體範，衣紋貼附肌體，宛如出水之狀。曹仲達本係西域人，他的畫脫胎於這種雕刻形式是很可能的。不但衣紋如此，容相亦然；我們一查晚近在新疆發見的壁畫，就可得到若干有力的例證。郭若虛前引書說：「雕塑鑄像，亦本曹吳。」我這裏應該把他的話轉一個身說：「曹氏作畫，本於雕刻。」擬彫刻的繪畫，歷史上不是沒有的，彭拜戎（Pompeii）所發現的壁畫中，有些描述希臘神話的，所作的人物竟是希臘雕像的複寫。（參見 G. Rodenwaldt「彭拜壁畫研究」）唐人畫佛，衣紋方面雖有吳道子的一翻革命，而容相方面為要保持宗教的莊嚴神祕，一直留有些擬彫刻的傳統，所以我們如不加判別的看古畫佛像的容相，總是

有千篇一律之感，就是這個緣故。其實宋以後的佛畫，擬彫刻的程度日漸薄弱了。永北石刻的容相，雖不敢說是唐式，但至少是宋式而留有些唐意的東西。至於衣紋之為蘭葉描，係吳道子所獨創，這是何良俊「書畫銘心錄」裏所說過的。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初唐畫家閻立本的帝王圖，人物衣紋是用「鐵線描」的，延光望印行的吳道子送子天王圖（恐是宋人臨本），人物衣紋是用蘭葉描的。但吳道子的作品不盡是蘭葉描，李伯時所臨的五帝朝天圖，就為這肖吳道子的北宋武宗元所作的朝天仙杖圖（均有影印本），還有其他地方的石刻觀音像，都作鐵線描，而這永北的石刻恰巧是蘭葉描。這種描法是不容易討好的，所以圓通寺的翻刻便無生氣了。永北的石刻與送子天王圖比較，雖不見得超卓，然而流風未泯，可令我們領會何謂蘭葉描。論到服飾，永北的石刻完全是寫意的。燉煌的唐人佛畫，筆法儘管是鐵線描，而頭圍，緊身襖，披帛，佩褱和袖袷等統統可以辨別出來；寫實的成份還多。而永北的石刻除了頭圍外，其餘都不能分辨了。我們但能從那種博衣寬袖的形式裏，可以感到些吳帶當風的韻味而已。郭若虛前引書說：「彫塑之像，亦有吳裝。」這是我相信的，不一定彫塑學吳畫，恐是彫塑脫離外來風尚而自成風格的一種說法。我們觀看角直的唐式塑像和龍門的有些唐代造像，其衣紋流利舒暢，撇捺自如，確然像繪畫中的線描。

三年前在北平看見研究比較藝術的匈牙利人達加克（Zoltan de Takacs）君，在蒐集吳道子觀音像拓本，資以研究吳道子，我會想過要從石刻裏求些吳道子的消息是很渺茫的。但是再一想，我們對於吳道子一向是渺茫的，從石刻裏探求或者在記載裏兜圈子，略勝一籌。本着這個意思，我對於永北的石刻不免起了些感情。不過，我說牠是宋式而留有些唐意；說牠的原本是有來歷的；說牠是明以前的刻物；希望不完全是感情作用。

廿八年六月二十日寫於昆明

談吃飯和睡覺

陳雪屏

吃飯和睡覺是生活的基本需要。從兒提而至老死，誰都是餓了就吃，倦了就睡。人生種種的經營和謀算一大部分受這二者所推動。從行為發展方面來觀察，吃和睡的習慣養成得很早。一般人習而不察，對於食糧的多少，口味的好惡，以及睡眠時間的長短，認為由天性所決定，沒有研究和討論的必要。假使我們隨意提出幾個問題：普通流行的三餐是否最合於衛生？我們的食量如減少一部分，能否維持原有的健康？我們為什麼要睡覺，八小時的睡眠是否是最有益的規定？……恐怕很少人能夠回答，反以為發問者是在存心開玩笑。

人類文化的發展原很奇特：自然科學使我們去物質享受方面獲得絕大的滿足，但對於生活中若干根本的問題則至今還甘願自守愚昧，聽其自然，不想而且不能加以控制。一個果子從樹頭墜落，可以引起物理學家的關心，我們的食量和睡眠假定都能變更，而不致損及身體的健康，將在人類生活史中發生何種影響，却尚未為專家所注意，進而作系統的研究。

筆者情願承受開玩笑的罪名，簡單舉示幾個淺陋的疑問，作為飯後睡前思考活動將歸停頓時的一種刺激。

X X X X X X X

我們先談吃飯問題。

胃壁肌肉的收縮有一種節奏。收縮的強度每次增劇，肌餓的感覺也因而愈趨尖銳，直到得食以後，收縮暫時停止。靜止時間的長短隨年齡而顯示相當的差異。食量和食質同是決定因素；甚至於情緒的激動也足以間接使時間延長。有時食物在胃腸中尚未消化盡淨，收縮便開始我們照樣覺得飢餓。成年人忙於工作，或者一時顧不到去吃飯，久之適順飢餓的能力自會增加。足見「一餓就吃，不餓不吃」這一個原則是靠不住的。

食量的大小因人而別。從前父母們總是鼓勵子女多吃，多吃使身體強壯。這是一種迷信。重量不重質的結果，徒然擴大了胃納的容積。美國的時候小姐們，因為要保持她們婀娜多姿的身態，不惜用強力去節制食量。一杯牛奶，一塊小麵包，和一碟果子生菜，便組成她們的午餐。同她們相比較，我國的女學生，真可以說是，個個具有兼人之量。無怪在表面上看來，竟是如此壯碩！筆者回憶在中學時代有幾位同學，每餐吃饅頭常以半打為單位。他們自己以此為誇耀，他們的父母眼看著這樣的奇蹟，也在微笑中透露說不出的歡欣。這種偉大的食量，即便削減三分之二，而配以適合的蔬菜，也儘足以供給他們有機的需要，至少有一半的食料簡直等於白費。我國宴席的豐盛在世界是沒有匹敵的：大小冷熱一二十盤碗，消耗時間三四小時。到了酒足飯飽之後，醺醺然，陶陶然，渾渾然，摩腹而坐，幾乎不能動彈。暫時把全付精力用於胃腸的蠕動，再不想做正經工作。北方有一句俗話，所謂「吃飽頓」似乎便是描摹傻吃，傻坐，傻胖的神態。

每日三餐，而早餐較輕，晚餐最重，是一種極流行的分配方式。雖然我們習於慣常，安之若素，但如詳細加以分析，便覺得這種制度并不十分合理。嬰孩每日可以吃七八次，每次食量幾乎完全相等。成年人清早起牀，趕忙外出工作，不容許有細嚼爛嚥的時間，於是早餐質量減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於有些人，為省事起見，簡直廢掉早餐，似乎也並不妨礙健康。勞工在白天消耗精力最多，理應需要大量食物來補充，但實際上他們的中餐却很簡單。更以時間分配而論，普通成年人的早餐與午餐相隔約四小時，午餐與晚相隔約六小時，晚餐與第二天的早餐相隔約十三小時，疏密不勻到這樣的地步，大家并不覺得可怪。因為要適合成年人工作的方便，這一種制度纔成為普遍。此外別無理由。

飢餓又能引起心理的變化，使神情恍惚，易受激動，感覺虛弱，而且注意不能集中。飢餓的附屬現象最容易與疲勞相混合。經過長時間的工作，僅憑休息還是不夠，一定要等到飽餐之後，精神纔能恢復。美國食物學專家哈葛德和格林堡最近曾作一次大規模的試驗，發現飲食分配與工作能率有密切的關係。他們極力主張採用五餐或六餐制，總量比三餐制更可減少，但須注意品質和時間的分配。其他工作條件不變，僅將工人的餐數增加二次，便足以提高出產量。所謂「餐多傷胃」以及「餐多使人發胖」，又都是迷信之談，全不可信。

由量的着重，變而為質的着重，更進變而為分配的着重，還有待於專家的努力，使一般人能獲得較多的知識。同時也須經過長期的教育，將關於吃飯的許多迷信一概掃除，然後合理的吃飯方法纔易于被接受。此外如飯桌上體貌的養成，有關於社會適應；口味的嗜好趨於正常，足以促進發育；都應在童年即早加以一番訓練。但很少有人注意這一類瑣碎而無關緊要的問題。

我們再談睡覺。

關於睡覺的事實，我們知道得更少。人類為什麼要睡覺？這是一個難解之謎。生理學家說是因為腦部血液供給不足；化學家說是自動中毒；組織學家說是神經纖維組織間的細胞腫脹，使一部神經原隔離，故不能接受外來刺激；生物學家說是反應黑暗的本能；心理學家說是工作能率減至零度便自然入於昏睡狀態；這種種的學說各有偏重之點，但沒有一種可以將事實完全解釋得清楚。我們隨意舉一個例子，便足以證明這些學說的破綻。當一位母親在酣睡的時候，門外軍聲驟驟，人語嘈雜，驚不破她的好夢。身旁愛子稍一轉側，或欠伸低喊，她就會立刻醒覺。假如孩子生病，她更能接連三四夜目不交睫，以後也并不需要將所缺的時間如數補足。試問業已中毒或失去知覺的人能自動保持清醒的狀態麼？

初生嬰孩平均要睡十九小時，到了十八歲左右減至八小時半。普通以八

小時為成年人最合衛生的睡眠時間。但據名家調查，有一件事實值得我們注意，即在同一發展階段中，時間的差異重大得驚人。以十五歲的青年為例，日常睡眠時間有的多至十一小時，有的少至五小時，而他們身體強弱和成績優劣的差別則不與時間多少成為密切的相關。究竟我們應該睡眠若干時間，方適合生理的需要，似乎是一個習慣的問題。一般人以為多睡有益無害，至少合於生活安全的政策；因為我們平日睡得多，遇有緊急事故發生，可以利用過夫積餘的睡眠，雖然暫時少睡，或竟一二日不睡，也還沒有很大的妨礙。這一種見解，與主張平日多吃以備將來，犯着同樣的謬誤。

我們可用兩個標準來分析睡眠：深度和性質。前者表明睡得好不好，後者表明睡得不好。我們普通先經過片刻的瞌睡，旋即入於熟睡。根據實驗的結果，熟睡時間僅有二小時至四小時，以後便漸漸進至半睡半醒的狀態。在這個時候我們開始做夢，而且易於被外界刺激所驚擾。所謂睡得好不好，受着若干因素的支配，如消化不良，服興奮劑等屬於生理的影響，如憂愁，焦急，思慮過度，接受暗示等屬於心理的影響。更有許多人驟然改易睡眠的環境，便不能安睡。深度和性質二者之間有一種密切的關係存在。假如我們在開始已曾熟睡二三小時，而在以後的時間雖然睡得不好，第二天照常可以工作；假如始終未得熟睡，即便睡到十小時，醒後必覺頭暈，目眩，煩燥不安，而且注意力難於集中。

歷史上有很多名人以少睡著稱。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每日僅睡四五小時，而他的工作是這樣的耗費心力，并且活到八十多歲。我們與其說他具有天賦的奇稟，不如說他善於睡覺。他睡得少，但睡得熟。普通人拿起筷子，大魚大肉，三四滿碗白飯，一掃而光；他的頭纏布枕，鼻息如雷，一睡便是九十小時；如此一生，碌碌無所表見。這是世俗所羨慕的庸人多福！

我們假如有決心，每日睡眠減少一二小時，在理論上是說得通，而且在事實上是做得到的。睡眠的多少既由習慣所養成，當然不容易立刻加以變更。驟然從八小時減至六小時，一定使我們覺得精神萎靡，而且影響到工作的

效率，正如同我們有吸紙烟和飲咖啡的嗜好，一旦戒絕，必大感苦痛。在開始的時候，僅減少一二十分鐘，然後逐漸增加，經過長久的時間，我們的習慣便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建立起來。世界上每一個人將睡眠減少一小時，轉而用之於有益的工作或創造的活動，將來人類社會的進步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是不易想像的！

X X X X X X X

根據上面所談的事實，我們似乎不免吃得太多，睡得太久。筆者曾經妄想：「少吃，少睡！」可以用來作抗戰中絕好的宣傳標語。但仔細再想：大多數人的吃飯根本發生問題，更說不上質的選擇和分配；而且現在流行的生活方式如不徹底改革，少睡覺，反而使許多人多費心機作不正當的謀算，或者多吸幾筒鴉片，多打幾圈麻將。所以筆者只敢隨意談談，決不敢大聲急呼來公開提倡。

本期撰者

嚴中平先生服務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經濟建設的目標」討論我國此後整個經濟建設所應注意之點，是一篇極關重要的文章。作者嚴先生在本文裏已提出了過去經濟發展的若干病症，我們更希望嚴先生及國內其他經濟學家能提出建設的原則，供大家的切磋研求。

谷春帆先生供職郵政總局，也是一位經濟學家，著作多着重於經濟方面。這次谷先生有一長文，論「中國民族主義之前途」，共分四大節，即（一）被抑制的民族意識——中國史的原動；（二）近代民族主義及其在中國之發展；（三）中國成爲民族國家的條件；及（四）中國向那裏走？——中國式的民族主義。本期所載「中國民族意識的推動」即爲長文的首節；其餘各節當在以後各期連續登載。

戴世光先生是統計專家，現在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担任工作，在本

刊常有文章發表。

滕固先生是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研究藝術與考古，此次承賜一文，論永北石刻吳裝觀音像，可使讀者得到一些關於滇省石刻派別的知識。

陳雪屏先生從前已有過文章。此次他用最通俗的文字，討論人生日常最重要的兩大問題——吃飯與睡覺。

今日評論
編輯兼發行者
印刷者
價目

每星期日出版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正中書局服務部雜誌推廣所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零售每份五分
訂閱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半年二元

交通銀行

行銀業實國全展發爲許特府政民國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報電 話電 址地 行分明昆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碧金

聚興誠銀行

重慶總行 商業場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全國各大商埠均設分支行

各種匯款
各種存款
抵押放款
匯單押匯

活期儲蓄
定期儲蓄
整儲支息
存取兩便

代客買賣貨物
代辦報關轉運
代理各種保險
代理太古聯運

商業部
儲蓄部
信託部

中國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本行為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毋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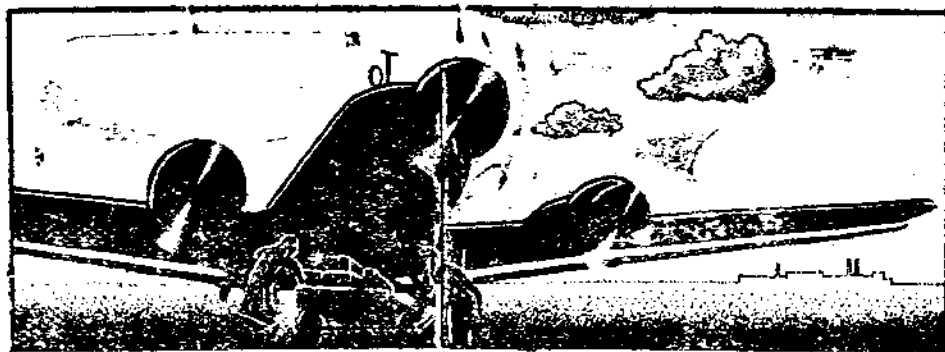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金城銀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尚義街三號